

MILLEN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千年末世之乱

1813年八卦教起义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美〕韩书瑞 著
陈仲丹 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 东 主编

MILLEN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千年末世之乱

1813年八卦教起义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美」韩书瑞 著

余中孚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美]韩书瑞著;陈仲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3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6836-1

I. ①千… II. ①韩… ②陈… III. ①白莲教起义—
研究—中国—1813 IV. ①K249.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7811号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Copyright © 1987 by Yale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6-329

书 名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著 者	[美]韩书瑞
译 者	陈仲丹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装帧设计	陈 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页2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836-1
定 价	29.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译者的话

本书是美国学者韩书瑞根据她的博士论文修订充实而成的，原书出版于1976年。当年韩女士是一个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青年学子，而现在她已渐近老年，在“耳顺”和“古稀”之间游移。真是岁月无情，虽没有白驹过隙般迅疾但也流逝得不慢，然而可幸的是韩女士一向惜时如金，嗜学深思，勤于著述，已写出好几本厚重的中国学研究专著，全都在美国有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算得上是成果斐然。若说句褒扬的话，她的光阴没有虚度，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韩女士的著作不少，不过要是排起队来本书有资格当排头兵。一则出版最早，万事靡不有初，这第一的头衔是免不了的；二则本书的蓝本是她的博士论文，对博士论文作者总是会精雕细琢，其中当耗费了她不少心血，说是代表作估计她本人也会首肯。正因为如此，韩女士希望本书能有机会译成中文，在中国的学者、读者中流传。她对我从事这一译事颇为关心。我所用的翻译底本就是她寄来的，在书的扉页还附有签条，感谢我做这件事。受到这一远在万里之外的嘱托，我也欲不辱使命，想要按时保质做好本书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翻译进程中，隐约听到韩女士的身体欠佳，我则在遥

祝她早日康复的同时加快了翻译进度，希望能以译本新书对她稍有慰藉。可喜的是，就在我即将完成译事的当下传来好消息，韩女士已战胜病魔，又可继续全身心地授徒撰述了，真是天佑良善，斯文永延。

韩书瑞是她的汉文名，英文名为 Susan Naquin。据她介绍，这一名字与法语有关，许多人在读她名字时不按法语发音，常会念错，或许她若干代前的祖先是法国人。她在上中学时曾迷上了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小说。赛珍珠是一个在华传教的美国教士的女儿，出生在中国，所写小说也多以中国为背景，其中最有名的是《大地》，1938年赛氏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读了这些小说后，韩书瑞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萌发了“一定要到教中文的一个大学”去读书的念头。后来她进了斯坦福大学，学习历史，其间曾获得前往台湾学中文的机会。后来她又进入耶鲁大学，师从著名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获得博士学位，而本书则是她这段求学经历的最终成果。其后，她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993年去普林斯顿大学，现任历史系教授和东亚系执行主任。

在本书的“致谢”中，韩书瑞首先感谢的是她的导师史景迁：“本书即从他的帮助、敏锐洞察力和准确判断中获益良多。”“他还教导我要把书写得有故事性，且还示范我如何做到这一点。”对如何“把书写得有故事性”，史景迁不愧为行家里手。他写的书尽管都是历史著作，却本本畅销，这与他擅长讲故事有很大关系。据说，史教授在耶鲁校园开中国历史公选课是一道奇景，每次都有几百上千的学生选修，连带着使得在耶鲁学历史的众多中国留学生有了当助教的机会。与乃师相比，韩女士似乎没有这样讲故事的能力，她更多的是依据丰富的史料复原历史场景，旁征博引，丝毫不回避史学考证的精细繁缛，本书就是一例。带有这一学术风格的个人专著还有《北京：寺庙和城市生活，1400—1900年》，这是她最新的著作，出版于2000年，篇

幅厚达 800 多页,研究北京寺庙与民众生活、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北京首都图书馆收藏的寺庙碑刻材料。

与她的导师每有著述即有中译本不同,韩教授的著作起初很少被译成中文。她对此的解释是其著作涉及的内容“太复杂”,也就是专业性强,这样有兴趣翻译的人就不会多。而这种状况近来有了变化,除本书外,译者还曾翻译了她与罗友枝(Evelyn Raskwi)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前几年,她的《山东叛乱——1774 年王伦起义》已译成中文出版。听说《北京:寺庙和城市生活,1400—1900 年》也有人正在翻译。这样她的主要著作很快就能以全貌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人们并没因其表面的“太复杂”而忽略其精彩的内核。

本书的中文译名为《千年末世之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以前有人按字面译为《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译者以为“千禧年”一词多在基督教文献中使用,而在中国大众宗教中表达相近意思用的多是“末世”、“末劫”、“劫变”一类词汇。在许多民间宗教经卷中描述当时的社会是动乱不已的“劫变世界”,只有救世主降临,大劫过后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和安宁。到清代,八卦教将这种劫变观念发展为三劫应世说,认为有青阳期、红阳期、白阳期三个劫期,此后无生老母要派弥勒佛下凡应劫,救度世人。而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是以“千禧年”表示在世界末日到来前上帝(天国)在世上统治的时期。两者之间意蕴可相比附而又有差异,在用词上显有中西之别,故而作此更动,以求回归原本的语境。

就韩书瑞教授的学术历程论,她是以宗教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范围主要在明清时期,即西方学者所说的近代早期。本书是她学术路径的起点,在形成其学术风格上有着重要作用。译者耗费数年时光翻译此书,早晚翻阅,孜孜不弃,前后通读不下十遍,对其特点也略有所知,现归纳为以下几点:

小切口而大纵深 1813 年的八卦教起义在历史上是件不大不小

的事。说其小也不小，八卦教教首林清策划，命人分两路攻打皇宫紫禁城，弄得嘉庆皇帝大惊，下《遇变罪己诏》；说其大也不大，正史上是点到为止，除当时人写的《靖逆记》外，至今还未见有人为这次起义单写一本书。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等大事相比，这又要算是一桩小事。本书作者竟“小”题大作，先将之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后又扩为数万字的大书。就是将其放在中文语境的学术著作阵列中，本书也要算专而深的一类，在学术上自有其显微昭彰的追求。不过外表的切口虽小，内里却是五脏俱全。由这次起义向里深探，向前可追溯大众宗教主要是白莲教（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的缘起，其教义、教规、活动规律等，向四周可考察这次起事的组织特点以及官方的镇压手段等，最后还可与其他教派活动甚至其他有影响的事件进行比较。作者的视野还不止于此，她提到：“因为本书的研究只是列举了白莲教组织的一个个案，所以它仅描绘了多样而变化的白莲教义内容的一部分，叙述了一次由教派领导的起义。对这一宗教的信仰的活动的进一步研究可揭示其是如何产生、发展，并在先是面对清朝征服，后面对安定、繁荣岁月，以及19世纪的剧变、外国人和外来宗教的来临，和20世纪的混乱和新正统观念出现时所产生的反应。”正是从这一视野着眼，“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也必须置于一长串由教派发起的起义的场景中来考虑”。这就使其学术视野有了最大限度的纵深感。

搜寻史料竭泽而渔 韩女士研究中国清代史和我们研究罗马史一样，研究的对象都是域外文明。研究域外文明，对研究者来说比视野开阔更难做到的是掌握丰富的史料。由于地域的相隔加之非母语的疏离，研究域外文明在史料的搜集和使用上总会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掌握史料难得如意。而本书是个例外，作者对相关的史料可谓搜集殆尽，几达竭泽而渔的地步。书中所用的主要史料，印本有《靖逆记》、《嘯亭杂录》、《钦定平定教匪纪略》、《清实录》、《那文毅公奏

议》、《破邪详辩》、《林案供词档》等，档案有《宫中档》、《上谕档》、《剿捕档》等。尤其是后一类史料更为珍贵，这些清朝档案都收藏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韩书瑞是最早前往台湾利用清朝档案的美国学者之一。这批档案对她完成本书十分关键。后来她能写成《山东叛乱》一书，也主要得益于对清朝档案的继续利用。这样深层次地利用史料，别说是外国学者，即使是中国本土的学者做到如此程度也不容易。再说，作者还能利用她对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大量引证各种外文文献，对中国学者更有参考旁通的价值。

考证精详 翻开本书，会发现这是本考证精详的学术著作。除正文有内容的考实外，书中的注释十分详尽，整个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有的地方甚至多于正文。这种著述的风格不像是美国学者通常的做法，倒与几十年前老派德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相近，或是与中国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之风合拍。究其注释有两类：一是出处的注释，某一活动、某一事物在档案、文献中某处出现，不厌其烦，一一列出，以示所言不虚；另一是内容的注释，对某一现象详加考证，何人在何书提及，情形如何，有何变化，不厌其详。现在的学界已少见这样的著述，刊印一两本，让大家知道曾有人如此治学，或有厚重学风的效果。

好话说了三点，是否也有不足。归结起来似也有两点：一是在史料引用时因理解有误，有些地方意思翻译不确，译者在核对原文时都做了改正，好在这样的讹误不多。二是在义理上有的地方分析不够深入，这在书的“结语”中可见出，有些问题在提出后未能展开论述。但这些不足与其显赫的成功相比是不必苛责的。

译者对本书尽力想译得好一些，在用语上尽可能贴近事件发生的时代，以回归历史场景，有时一个地名的翻译也得用上福尔摩斯的侦探技法，反复考量。书中能查核的原文都进行了回译，有少数地方在遍查无着的情况下则酌情试译。有人称“电影是遗憾的艺术”，以

示其有改之不尽难得完善的特点。而译作与电影一样似乎也是遗憾的艺术，本译作想来也会有不当之处。读者若是在赏目阅读时发现了问题，径请告知译者。好在译作的改动要比电影容易，在再版重印时就能正误。经过反复修订，译作的质量或能差几与原作相配，以对得住原作者的辛劳。

地图目录

华北平原府县 49,61,66,88,108,129,142,242

北京及郊区 70,156

坎卦教徒居住的村庄 103

北京城 177

紫禁城,八卦教徒行动路线 187

滑县和浚县 222

官兵进攻路线 254

李文成逃跑路线 266

致 谢

我很幸运有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这样的老师和导师。本书即从他的帮助、敏锐洞察力和准确判断中获益良多。他对八卦教一直抱有兴趣,由此给了我鼓励,并让我感到颇多快乐。他还教导我要把书写得有故事性,且还示范我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还要对其他全部或是部分读过我博士论文并提出改进意见的人表示谢意,本书就是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们是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白蒂(Hilary J. Beattie)、庄吉发、罗吉·德福奇(Roger V. DesForges)、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芮沃寿(Jr., Arthur F. Wright),还有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朱迪·梅特罗(Judy Metro)。耶鲁大学东亚书库的安东尼·马尔(Antony Marr)和金子秀夫(Hideo Kaneko)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乔治·波特(George E. Potter)多年来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

欧大年在我之前早就对白莲教有兴趣。他慷慨地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助益,很高兴能与他分享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还要感谢其他在台湾的朋友,他们让我了解到中国的大众宗教,并带我观察仍还在流行的大

众宗教。我特别受益于耶鲁大学的黄伯飞,他以丰厚的学识和耐心帮助我读懂清代文献,尤其是那些与宗教活动、观念和象征意义有关的文献。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档案对这一研究特别重要。我最为感激的是博物院院长蒋慰堂(复璁)博士以及博物院图书文献部的职员,他们允许我阅读这些材料并给予了善意的帮助。最早是白彬菊让我注意到1813年的攻打皇宫事件,她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嘉庆朝档案的熟悉使我在她的工作变得容易得多,颇感欣慰。我还要感谢美国大学女学者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和耶鲁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委员会(Yale Concilium o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它们向我提供了财政资助,使我有机会去台湾使用这些档案。

对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多年来一直关注我做什么事的家人和朋友,我要高兴地对他们说:“瞧,就做这些事。”

韩书瑞

写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1975年3月

1813年春,自称八卦教的教派策划了一次同时在华北几个城市(其中包括北京)起事的起义。这些教派的成员是一个已有三百年历史宣扬千年末世劫难的宗教的信徒,他们信仰的主神叫“无生老母”。教派首领许诺,这次起事注定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开创一个“无穷富贵”的新时代。起事按计划发动,但协调得很不好。想要占领北京紫禁城的尝试很快就失败,官军迅速被派出去恢复各省的秩序。起义者后来被围困在豫北的一座城里,经过三个月的战事这座城被攻克,八卦教起义最终结束。

对这次反叛史学家的称呼不一,这种混乱的情况反映了对之研究不够。虽然让人意想不到的的是有丰富的原始材料可用,但对这个问题竟没人用汉语、日语和西方语言做过专题研究。^① 中国的农民运动和民众起

① 最好的英文叙述见恒慕义(Arthur W. Hummel)等编:《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华盛顿:政府印书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年,第585—586页,书中由房兆楹执笔的那彦成传写到了这次叛乱;德·格鲁特(J. J. M. de Groot):《中国的教派活动与宗教迫害》(*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阿姆斯特丹,1903—1904年,1969年台北重印本,第401—469页。最好的中文叙述是《靖逆记》,由文人盛大士以笔名“兰蓂外史”撰述。该书出色地详尽描述了这次起义,内容包括对官兵作战的叙述,还有对主要起义首领生平的简介。而更常见的介绍或许可以在魏源的《圣武记》(1842年)第10卷中找到。昭槿在《啸亭杂录》(约在1814—1815年完稿)中的(转下页)

义并不总是研究的热门课题,在最近的著作中 1813 年起义不为人注意,人们更关注 19 世纪中期那些大的反叛事件(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回民起义),这些事件对帝国的秩序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有更明显的影响。再者,1813 年发生的事正好处于清中后期不为人关注的时段,对中国“近代”历史(通常被认为从 1840 年开始)来说它太早了,而对“早期”清史(现在已延至 18 世纪后期)来说它又太晚了。然而,八卦教反叛是鸦片战争(1840 年)前在华北对清政府构成真正威胁的最后一次起义,后来西方势力就侵入了中国。据称当时中国正处于衰落时期,军队无能,官员腐败,国库空虚,而叛乱却被清政府迅速并有效地镇压了下去。这次叛乱组织完善、历时较长,使皇帝感到震惊,花费了几个月时间才将其镇压,而其规模不大又让外人难以弄清其核心组织和动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好机会。

或许更重要的是,八卦教起义在清代(1644—1911 年)华北的农民起义中是相当典型的,它是通过组织教派宣扬千年末世思想而表现出来的。虽然在中国清代常有这种受到宗教鼓动的农民起义,但它们却不为西方史学家重视。在历史文献中一再出现叛乱者和叛乱群体各种各样的名称,让人弄不清这种宣传千年劫变宗教的性质。宗教教派与各种犯罪团伙被归在一起,笼统地称为“秘密社会”,它们都是现存秩序的反对者。有些历史学家假定在这些组织中有地域的区别,但对华北和华南的组织有何差异仍争论不休,既不能明确加以区分,也不能进一步说明问

(接上页)叙述(第 4 卷,第 44—59 页)很生动但不太可靠。有两篇中国当代历史学者写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论文,张一纯:“关于天理教起义二三事”,《历史教学》,1962 年第 1 期;萧育民:“清嘉庆天理教起义”,载《中国农民起义论集》,北京,1958 年。据我所知日文有关的文献有,小野田佐代子:“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徒叛乱”,《史草》,1966 年。

《靖逆记》的作者盛大士在书的序言中谈到,他在 1814 年走访了当时的目击者以及参与镇压起义的人,还参考了 1816 年出版的《钦定平定教匪纪略》中的文档。不过上述作者都没有查阅现在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中的档案。

题所在。^① 有些历史学家看到其在北方有相似性,显然更多带有宗教秘密社会的特点,于是他们认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完全是一个历史悠久善于伪装的称为“白莲教”的密谋集团的分支。^② 这些宗教群体与叛乱之间有时涉及到的联系能够感觉到但却不好理解。

我在对“白莲教”做详尽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是,这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神秘组织,而是由信徒组成的众多分散的小团体。自16世纪以来它就通过绵延、松散的师徒联系传播其共同的教义。这一宗教的信徒通常只关心自己个人的祭拜活动,但他们也预料将会出现一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到那时他们就不能过正常的生活,而要去追随被派来引导他们的神,团聚在一起毅然起事,开创一个完美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人通过自己的信仰也只需要靠其信仰来获得拯救。在其首领预言千年末世已迫在眉睫时,这一分散传播的异教的信徒就正好成了公开反抗国家和现存秩序的叛乱者。正是这一在看来分散却又实际很有凝聚力的组织中长久存在的末劫观念,让信徒和反叛者使同样的拯救过程有所不同。³

1813年的八卦教反叛是这些教派在其漫长历史上所进行的众多起义中的一次。通过这一个案可以了解到,那些有着共同信仰的分散信徒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受引导要冒捐躯毁家的危险在人间建立天国的。另外,这次叛乱的观念和组织也可以作为一种尺度,以此可与后来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起义进行比较,弄清并理解它们有何新的内容,或是

① 见让·谢诺(Jean Chesneaux):“中国历史变迁中的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s Historical Evolution),载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社会,1840—1850年》(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850),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陈志让(Jerome Ch'en):“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清史问题》(Ch'ing-shih-wen-t'i),第1卷,第3期(1966年),第13—16页,这两篇英文论文概述了在中国出现的主要争论。有关这个问题两篇最重要的中文文献为,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广州,1910年,重印本见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台北,1965年;熊德基:“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及其相关诸问题”,《历史论丛》,1964年。

② 例见朱永德:“对中国历史上白莲教的初步研究”(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the White Lotus Sect in Chinese History),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

有何传统的内容。这些比较会对我们理解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有意义,义和团运动受到了白莲教的影响。还有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 年),这次起义未受白莲教影响。

清政府对镇压八卦教起义非常重视,结果所有与这次反叛有关的主要官方档案都得以保存,有一些还得到出版。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八卷文档以及许多其他更具体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些教派、它们短命的起义,尤其是现有和潜在叛乱者的极为丰富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官方档案是通过敌视起义者的官员的目光去描述的,由于几乎全是由统治阶级来记载,因而所有这些反叛在后代人看来都显得很有选择性且很雅致。八卦教起义是特别让人感兴趣的一个事件,因为在官方文献中有许多策划、组织这次叛乱者的供词。

清代各级官员通常的做法是要在判决被捕者之前审问他们,并将审讯笔录上报。在 1813 年的叛乱事件中这一程序执行得特别认真,一直被送至最高层,因为在朝的嘉庆皇帝(1796—1820 年)认为攻打紫禁城是对他个人的冒犯,而且在离朝廷这样近的地方居然有这个危险团伙存在简直让人不能容忍。被抓的叛乱者受到了仔细的审问,要他们交代参加教派和叛乱活动的性质和内容,搜捕和审问的过程至少延续了五年。有 4 不少于 400 人的口供保存了下来,虽然在细节上不总是那么可靠,^①但它

① 我参考的文件包括参加 1813 年叛乱的 367 个人的 471 份供词。这些人中 60%(221 人)住在北京地区,其余来自河南、山东和直隶南部,他们没有参加攻打皇宫。这些供词的出处(因文献不同而未能顺序排列)如下:地方志 8 份,《教匪案》41 份,《那文毅公奏议》31 份,《钦定平定教匪纪略》83 份,《林案供词档》92 份,《上谕档方本》140 份,《宫中档》76 份。几乎有 50% (《上谕档方本》和《宫中档》中奏折所录)只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自然大多教派成员或是叛乱者都想要否认或是减轻他们参与犯罪活动的责任,就此而言他们的话本身不能相信。不过在北京地区的教派成员和叛乱者的案子中几乎每个案子中都有其他参加者确凿可靠的旁证。官府的审讯者不断提审,特别关注其他人的活动,在北京教派的案子中两百人相互对证的证据一致,因而是可信的。我还注意到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会减轻其亲戚参与的罪责(或是不承认有这个亲戚)。许多教派首领尽可能只交代几个信徒的名字,在这点上有些最高层首领的交代最无价值。例见《钦定平定教匪纪略》,(转下页)